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沈刚伯 著

史学与世变

海豚出版社

ENLIGHTENMENT

海豚启蒙丛书



史学
与
世变

沈刚伯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与世变 / 沈刚伯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10-2386-5

I. ①史… II. ①沈… III. ①史学—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919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策 划: 吴兴文

责任编辑: 曹振中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880毫米×1230毫米)

印 张: 6.5

字 数: 80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386-5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沈刚伯



沈刚伯（右1）、胡适（左1）、朱家骅（左2）、蒋梦麟（右2）

缘起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第一章开始，便昭示国人学习的起源，在一个“学”字。何谓“学”呢？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觉”，按现代人的说法，即为“启蒙”，小自国学中的蒙学，扩大至终生学习。有趣的是，班固之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将其解释为“效”，亦即今人所谓的“仿效”。班固从哲学上定义，许慎则从经学着眼。启蒙和仿效成为古人学习精神所在，直言之，启蒙为体，仿效为用，但启蒙无疑是学习的第一要义。

西方到19世纪为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时代。20世纪则是摒弃神的人的时代，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之花盛开。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媒介、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但是，学习的方法基本不变。变的只是如何将衍生的知识和媒介，甚至将意想不到的信息组合在最合适的地方。就像用关联性方式陈列书的书店，思考那本书旁边为何摆这本书等，想象一下摆书人的“观点”为何。这也是一种启蒙，它有着发散式的思维，使

人成长，使人经历意想不到的经历。仿效也一样，有时会变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仿效。

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文化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编辑也一样，他编书，他为作者服务，他为读者摆渡，编书就是他的天职。网络阻碍不了读者，也阻碍不了作者，它无法主导一切，但启蒙却是学习的基本精神。透过仿效将知识传承下去，通过启蒙不断地和过去的知识磨合，从中发现新的结合点，取得更多、更好、更新的知识。

将近二十年前，沈昌文先生为我引见俞晓群社长，没想到俞社长快人快语，从撰稿到出书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出版了我在国内的第一本书——《藏书票世界》。虽然该书以图为主，但这无疑为当时尚处在启蒙阶段的藏书票阅读打开了一扇窗。这期间，每当我到北京出差，正逢他自沈阳而来，我们总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维持同行兼同道的关系。特别自2009年他担任现职起，每当有新的出版成果，他都会与我分享。2014年10月，我们一起到台北参加两岸书展，共赴王云五纪念馆参观。置身其中，仿佛叮咛我一定要做点事。

“启蒙文库”缘起如上，特以为记。

史学大师沈刚伯

沈刚伯，名汝潜，字沈大烈，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生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梅花村（绕围坡）。小时父亲在外忙，经常几个月不见面。身为长孙，全由祖父带。最早接触《史鉴节要》，念完就读《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等经书。11岁入湖北方言学堂。12岁以后祖父不管其读书，无意中培养读历史的兴趣。14岁宣统二年（1910）毕业后，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1917年毕业。1924年考取官费留学，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埃及学、英国史、宪政史。

出国留学，虽然短短四年，却抱定不在学位，只在学点东西。向往埃及，爱好考古，是国人中学埃及的第一人。他还想，埃及是拥有最古老文化的国家，如果能将埃及考古的方法学过来，整理我国的文化多好。除了整天在大英博物馆研究

外，还计划参加考古队前往埃及。由于北伐开始，沈刚伯的湖北官费停止，他只好拎着行李回国。

1927年，经俞大维介绍，至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洋文化概论等专门史和国别史等一系列课程。当时能在中国大学专门讲授如此繁多的世界历史课，国内尚无第二人，实为在中国开辟世界史研究的先驱，真是一位有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的学者。他讲课娓娓道来，如同目击，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却又有条不紊。

沈刚伯说：“历史是人类的教育，读史可以使人聪明。”“读书的第一步就是博览，然后，再将所读的连起来贯穿，返回到约，弄些小东西来研究。”“在人的一类学问中，需先研究历史。因为，一切文哲、艺术、宗教及一切社会科学，都是人类某部分行为的研究，而历史更是古往今来整个人类一切行动的总记录，如能大致知道人类以往的状况，自然容易了解人类现在的行为。”

沈刚伯从不去出版专著，也不曾发表过一篇长篇的学术论

文，他把精力孜孜不倦地放在教课和开设更多新课上，而他的学术业绩都在受业学生的笔记上。对此，他解释说：“学无止境，思想见解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辩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向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1942年秋，他继金毓黻出任中大历史系主任，他为提倡对西北边疆问题之研究，组织边疆研究会，延请专家讲授维吾尔文，聘韩儒林讲新疆史、蒙古史，请金毓黻开东北史课程。所以，在国内大学的历史系中重视边疆史研究者，首推他主持的中大历史系。

1944年，他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授。1946年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47年改名政治大学）任教，仍在中大历史系兼任教授。

1948年，沈刚伯应教育部长朱家骅坚请同赴台北协办台湾大学，相继受到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钱思亮重视，担任台大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在1948~1969年主院期间，他为推

进院务和提高学术水准不遗余力，设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图书馆系，加上原有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四系，使台大文学院有六个系。1949年增设文科研究所，后于1956年增扩为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4个研究所，1966年又增设外国语研究所。1967年起，中国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招收博士班，把历史研究所的硕士班分为一般史学、近代史、中国艺术史三组。沈刚伯于1954年3月与在台史学家组织成立台湾的中国历史学会，任理事长，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中有胡适、张其昀、方豪、李济、姚从吾、罗家伦、蒋廷黻、萧一山、劳干、郭廷以、董作宾、毛子水、李宗侗等。

1957~1972年间，沈刚伯与李济在台湾共同主持“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工作，主持东亚各国与西方各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活动，对台湾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起到鼓励和推进作用。1970年，沈刚伯以其学贯中西、开史学新风、对中国史学及文化与外来文化之关系的独到见解，被遴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沈刚伯说：“‘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指出，史学目标在‘通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就是世变。史学要通世变，但也

常常被世变所通，结果‘一家之言’不成，自己却窘态毕现。”《史学与世变》是作者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虽然篇幅不多，但对于青年读书、学历史颇有助益。其中回忆董作宾、蒋梦麟、朱家骅三篇，使我们对五四那一代学者的治学与为人，有了更多了解。

目 录

I	史学与世变
18	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
28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41	历史教育的推广和简易的参考资料
46	如何学历史
54	说“史”
69	孔子的教学
74	孔子学说的门径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停顿
81	秦、汉的儒
105	方孝儒的政治学说
131	缓
136	怎样为自己准备将来
140	起义前后的见、闻、经历

- 161 对日本民族的三点愿望
- 166 大英帝国的没落
- 174 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
- 179 我所认识的蒋梦麟先生
- 186 追记骊先先生的言行二三事

史学与世变

今天欣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的大庆，我是专诚来道喜的，承李所长之命，在这儿提出一个问题来跟大家谈谈，尚望各先生加以指教。

今天我要提出来谈的问题是“史学与世变”。世界上有了人，就有历史，但是，有了历史，不见得就会产生史学。古代曾有许多文化相当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等，都产生过很优美的艺术，很玄奥的神学同很实用的科学，但是，他们统统没有能够产生史学，尽管他们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史料。这些文化都以神道为主，人世间一切的创造都附丽于宗教之下。像那样以超自然的势力为依据的文化是不会产生史学的。能产生史学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为本。那就是说，它承认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经过理智的考虑，而后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切结果都应自负责任，其动机与

影响才有供人研究之价值。这种研究便是史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化，实只有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希腊才有史学。可是这史学并不是在这两种古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是在那些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之后，而忽然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它们的政治结构濒临崩溃，社会组织大大动摇，经济生活和礼教活动都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才产生史学。

史学产生以后，物质环境仍然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这原因是不难推测的。因为人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这些新观念就形成了新史书中的各种重点，如，维护正统或鼓吹革命，阐扬神权或提倡民治，羽翼道德或崇尚自由，重视经济发展或注意社会动态，倡言国家至上或宣传世界大同，遵循进化理论或主张治乱循环，等等。凡此种种不同的中心思想大多数是受了旁种科学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其纯粹从旧思想中推演出来的偶亦有之，却是比较的少。

有了新的历史重心，当然对于旧史料会有新的解释，新的组合同新的价值。原来所认为史事上的因果关系，现在也许要找出新的线索和新的影响。有时还感觉到旧的史料不够用，因而必须重新从地下或古书中去发掘新史料，或者从旧有的传说，从国外的图籍，从别种有关的学科里面找出可做比较研究的材料。用新的史料，来配合新的重心和观念，就得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编着的书，一定有新的体裁。像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同新的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学，须得再变。如此日新又新地与时俱变，才能够使史学成为“人类的教育”。

中国产生史学，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修《春秋》，才正式产生史学。当时正是大变动的时代，东周的中央政权已经衰微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诸侯各自割据，成了无数的小朝廷，这是政治方面的情形。就社会变迁而言，则当时封建制度已开始动摇，中产阶级，尤其是士的阶级，渐渐兴起。他们已经打入政治界，并且开始掌握了一切学术。经济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候铁器的使用，已经增加了农业生产，同时商人阶级也起来了，他们的力量，往往可以影响到国内外的政治，甚至